



崇禮惟時

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

徐坚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時惟禮樂

中國禮樂文明的源流與演進

葛兆吉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后期资助项目

崇禮惟時

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

徐坚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惟礼崇: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 / 徐
坚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325-7272-4

I. ①时… II. ①徐… III. ①青铜器(考古)—兵器
(考古)—研究—中国—东周时代 IV. ①K875.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1011 号

部分图片归属现状不明或无从联络,特此说明。
敬请器物和图片所有者联系本社。

时惟礼崇

——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

徐 坚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6.25 插页 3 字数 273,000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800

ISBN 978-7-5325-7272-4

K · 1864 定价: 6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 序

夏、商、周三代是我国的青铜时代，在长达一千五、六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戈、矛、刀、镞、斧、钺、剑、殳等兵器一直是青铜器群中的重要门类，仅次于鼎、簋、鬲、甗、觚、爵、斝、尊、卣、壶、罍、觶、甗、簠、豆、盘、匜、钟、镈、铃、钲、铎、勾、铉等所称的礼乐器，在人们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宋代的金石学、清末民初的古器物学以至于现代的考古学，对青铜兵器的著录、研究一直不绝于书。这些著作，随着科技手段的运用和研究方法的提高，通过摹绘、照相、工艺分析、成分检测以及分类、分型、分式和功能与使用方法的研究，不仅保存了大量有用的资料，也大大提高了我们对兵器的认识。但不必讳言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传统研究方法的束缚，这些研究大部分是就物论物，未能将所谓兵器放在特定的出土和保存环境中、放在更广泛的联系和社会背景中展开，因而所得出的结论，就难免与其应该反映出的本质意义有一定的距离。

现在，摆在我案头的徐坚教授的《时惟礼崇——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书稿，便是冀望摆脱传统研究方法藩篱，以新考古学主要代表人物宾福德的考古学文化系统和层次理论为指导，从全新的视角出发，尝试对商和西周青铜兵器展开全方位研究的一部著作。正如徐坚在引论中所言，在这个观念下，对兵器的研究“就不能以传统的类型学区分和综合的方式完成，而纾解这一困局的方法取向就是物质文化研究方法”，而所谓物质文化研究方法，“具体而言，就是在宾福德的考古学文化系统和层次理论基础之上，分离出青铜兵器分别作为器具、标识和象征的表现，在不同的层面上，即不同的情境中，运用不同的方法，从物质回溯技术、经济、社会和精神”。

看一看本书的章节结构，我们即可知道，徐坚是严格按照他选定的理论体

系和方法展开研究的。

以“考古学文化系统观念下的青铜兵器”为标题的“引论”部分，在追溯和反思中国青铜兵器研究历程的基础上，着重从方法论角度阐释了所谓考古学文化系统观念的要点，即“超越物质形态的青铜兵器：从作为物证的物质走向超越文本的物质”，“重新观察青铜兵器的体系：宾福德的考古学系统观念”，“研究范式的转型：学术史的观察”，“青铜兵器的定名与分类”，和“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考古学文化系统观：结构与方法”。通过这五个小节的阐述，作者强调，自己对东周以前青铜兵器的研究，不是简单的、僵化的、孤立地将其当作物证的“物”的研究，而是像宾福德考古学文化系统理论要求得那样，将其放在特定的事物的联系中，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分为技术经济的、社会的和精神与意识的三个不同层次的研究。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看到的青铜兵器就不仅仅是具有杀伐和防卫功能的武器，而且是具有标识和象征意义的礼器，在一定程度上还反映了某种精神和意识。“引论”既是本书的指导思想，也是本书写作的总纲。

第一章“青铜兵器的形式分析：从蒙特柳斯式类型学到物质文化分析方法”。本章分为四个小节，即“形式风格分析的适用性和方法选择”，“东周之前的青铜兵器的形式谱系”，“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纹样分析”和“青铜兵器形态的功能化和美术化倾向”。该章对考古类型学创始人蒙特柳斯的类型学对考古研究的贡献和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检讨，倡导从遗物的形式分析发展到物质文化的分析，并选择戈、矛、钺、钺、刀、镞、剑、盾、冑等青铜兵器进行了形式划分，建立了形式演进谱系；选择戈、钺进行了纹样分析。由于作者熟习传统类型学方法，又经过物质文化分析方法的熏陶，他对这些兵器形式、纹样的分析，并未停留在外在表现的分类与演化上，而是进一步揭示出其形式、纹样演化的功能化和美术化两种倾向及其兼具的“器具”和“符号”价值，认为“两者贯穿了青铜兵器生产、流通和使用诸环节，青铜兵器的形态也是功能与形式、实用与非实用、标识与象征等多个侧面考量和角力的结果”，并指出“长期以来的研究过度关注作为实用器具的青铜兵器，往往忽略青铜兵器的‘符号’价值，或者至少认为非实用价值在考古学中是不可见的，但是形式分析却揭示出可接触性”。不过他又提出，“更全面地揭示青铜兵器的‘符号’价值有待于考古学研究超越形式分析”。

虽然在青铜兵器的研究中，也有学者很早就发现了商晚至西周墓葬中出现的毁兵和冥器化现象的象征意义，但总体上毕竟注意不够，徐坚的批评是对的，

提出的要求是正确的。

第二章“青铜兵器的社会层面意义：情境分析方法”。本章分四个小节，即“界定考古学情境”，“作为学术史情境的商和西周考古学”，“东周之前青铜兵器个案的情境分析”和“作为社会标识的青铜兵器”。其中，第一节是阐明什么是考古学情境及考古学情境分析的要点；第二节是对商周考古研究方法的反思，批评研究中的编史倾向和以文献为主导的倾向；第三节分量最大，是运用情境分析方法对偃师二里头、盘龙城、新干大洋洲、益都苏埠屯、安阳殷墟、长安张家坡、洛阳马坡与北窑、曲沃天马一曲村、宝鸡纸坊头、竹园沟与茹家庄、北京琉璃河、浚县辛村、平顶山、上村岭、曲阜鲁故城等十几个商周墓地墓葬的个案分析；第四节是讲通过青铜兵器在墓葬中的组合、空间分布特征及规律的情境分析，反映了什么样的层级、礼制等社会标识，指出“青铜兵器就是青铜礼器”。

第三章“青铜兵器的精神层面意义：认知考古学或者情境考古学取向”。本章也分为四个小节，即“认知过程主义考古学和情境主义考古学”，“青铜兵器的文化归属表达”，“青铜兵器的性别认知和建构”和“青铜兵器的禁忌和信仰”。第一节着重阐明什么是认知过程主义考古学、什么是情境考古学以及两者的关系，表明自己对东周以前青铜兵器精神层面研究遵循的原则。第二节，以柳叶形短剑为例，阐明在一般情况下，作为文化归属指征符号的价值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域会发生改变，指出“在厘定作为文化归属指征物的青铜兵器上，由于青铜兵器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而不涉及青铜兵器的形态、产地及生产传统，所以，形式分析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真正具有区分价值的是使用方式，因此我们仍然需要从组合和空间着手”。第三节，着重阐明青铜兵器在一般情况下具有性别认知的价值和意义，但这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墓葬随葬兵器是相当复杂的，有一般规律，也有特殊性，关键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第四节，指明作为思想性和观念性表达的偏好、禁忌和信仰，在墓葬随葬青铜兵器上是可以观察到的，但研究又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墓葬器物组合和空间关系与禁忌和信仰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因为“禁忌和信仰的流传范围和时间是变化的，既有可能广泛见诸共存的不同族群，或者在特定族群中延续相当长的时间，也有可能族群、阶级或者年代上极其受限，甚至不排除是由特定的历史原因或者个人原因造成的”。

第四章“早期中国的玉质兵器：从辅助线索到多元景象”。本章也是四个小节，即“早期中国玉质兵器的发现和研究”，“玉质兵器的形态分析”，“玉兵的

多元特征：以玉戈为中心”和“金石之缘”。第一节和第二节在玉器研究的论著中司空见惯，不必多言。第三节，着重强调“无论是玉兵的形式风格分析，还是对其形式风格形成的历史情境考察，都揭示出玉兵是一个复杂的集合概念，其界定建立在外部形态特征判断标准之上，因此玉兵内部高度分化，不仅在是否具有礼制意义上各不相同，在礼制意义的具体指向上也不统一”。第四节，是想说明，“作为辅助性线索，玉兵并不是独立于铜兵之外的平行发展线索，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复杂而动态的关系”，“玉兵和铜兵在形态上存在交互影响，即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可能互为原型，不同的模仿过程可能揭示青铜时代文化的不同侧面”；“金石之间并非只有替代、模仿或者更迭的关系，它们也可能合为一体”；“通过揭示青铜时代金石之缘不是金石更替，而是金石互补的过程，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青铜时代的社会和精神表达的多样性。玉兵作为铜兵的辅助性线索，而不是被替代的历史孑遗吁请我们关注与金石并存的多元线索，并再度提醒我们，单单依据铜兵，甚至铜器就能复原青铜时代中国是片面甚至误导的”。

以上我不厌其烦地将本书的引论和各章节的内容作出扼要介绍，是想告诉大家：这是一部以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为指引，全面、系统研究我国商周青铜兵器和玉质兵器的著作。书中对铜兵、玉兵的类、型、式划分我是比较熟悉的，除个别地方（例如将大洋洲墓葬的双面人首形神器归入青铜面具）尚需商榷，总体上看可以成立，挑不出大的毛病。至于运用物质文化分析方法、情境分析方法推导出来的那些涉及技术与经济、社会和精神层面的结论，则令我眼界大开、思路大开：研究的指导思想变了、方法变了，原来可以得出这么多想不到的新见解、新论断！就我读后的感想而言，至少有几项令我印象深刻，受益匪浅：

一、类型学和地层学一样，也是近代考古学两大理论支柱之一，类型学自传入中国以后有长足的发展，它对构建考古遗物、遗迹的分期和谱系发挥了重大作用，这是学术界有目共睹的事实。但仅仅固守类型学对遗物、遗迹的分类和型式划分，我们看到的只能是它们的外在形态，而难以从中发现更多的信息并推导出更多的结论。本书引入国际考古学界流行的物质文化分析方法、情境分析方法对商周青铜兵器和玉质兵器进行研究，并将这种研究细化为“技术经济的、社会的和精神与意识的”三个层次，是将国外考古学理论方法与中国考古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考古实践的具有创新性的尝试，值得肯定，值得提倡，值得学习。

二、青铜兵器的原本功能无疑主要是用于杀伐和格斗，但随着时间、地域、

时势、具体出土和存在情境的变化，它就逐渐被赋予了身份、地位、职业、性别、礼制等具有标识和象征符号价值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讲，“青铜兵器就是礼器”的命题是可以成立的，研究者可以由此出发，通过墓葬出土的青铜兵器去探索其背后隐藏的、从一个侧面反映社会状况的“礼制”。

三、墓葬随葬青铜兵器不仅是墓主人身份、地位、职业的标识和特定礼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反映一定的精神、意识和思想。商周时期墓葬中出现的毁兵现象，包括青铜兵器在内的铜器冥器化现象，究竟反映了什么禁忌和意识，许多学者结合古代文献记载做过探讨，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迄未形成共识。本书辟专章、专节讨论此一问题，但亦无定论。精神考古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将本书阐明的研究方法与考古学、历史古文献学、民俗学、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密切结合起来开展研究，也许是解决这类问题有效的途径。

四、将玉兵作为辅助线索开展青铜兵器研究别开生面，有助于青铜兵器研究的深化。有些玉质兵器（以玉钺、玉戚、玉矛、玉刀为例）的出现早于同形制的青铜兵器，由于其材质的珍稀，一开始似乎就是作为礼制组成部分的仪仗使用的。因此进入青铜时代以后，有的青铜兵器仿照玉兵的样式铸造，很可能一开始就具有了和玉兵相同的功能。当然，玉质兵器也模仿青铜兵器，不过随着玉兵本身的分化，例如西周时期大型玉戈和小型玉戈的分化，作为佩饰器组件的小型玉戈虽还保留戈的基本形制，但已失去原有的礼器的功能，而转换为装饰的一部分了。在这里可以看出，类型学的分型、分式和情境分析对推断玉戈等玉兵的功能变化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这本著作对我的启示作用当然还有许多，需要慢慢咀嚼才能享用。但也不是说在所有问题的认识上没有一点相异之处。实事求是而言，除前面提到的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那件被称为双面人首形铜器我不认为是一般的面具之外，书中对中国考古学存在以文献为主导的倾向的评价，我也不完全苟同。由于中国有大量古代文献留传下来，又不断有地下金石简牍文字出土，历来即有根据出土古物古文字证史修史的传统。在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初，受原来金石学、古器物学研究方法的影响，难免会出现一些这样的现象。但从中国考古学几乎是和古史辨伪运动同时兴起的产生环境及其发展历程和主流来看，并不存在让文献牵着鼻子走的倾向，从李济、梁思永到夏鼐，掌握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逾半个世纪的领导者都是受过西方学术训练、从国外回来的，他

们自己不会这么做，也不会给单位和别人开绿灯。自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国策以来，国外考古学理论方法一波又一波传入进来，在国内大展拳脚，也不可能再有围着文献打转转的环境，即使个别学者对此情有独钟，也改变不了考古学发展的主流。我自己认为：无论是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还是就整个世界而言，对古代历史的记述，无非是三个系统，一个是从口耳相传的传说到文献史学的系统，一个是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学系统，再有一个即是从摩尔根的蒙昧——野蛮——文明到马克思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社会学系统。三者都是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发展作出的概括。三者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传说史学、文献史学起源最早，难免带有神话色彩和错记、漏记现象；考古学虽然依据的是古人留下来的真实的遗迹和遗物，但对整个社会来说毕竟只是沧海之一粟，据此难窥全貌；社会学系统着眼的是社会发展大势，社会发展的阶段、规律构建起来了，生动、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却丢弃了。因此，三者应该是互补的关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关系，而不应该相互排斥。对考古与文献两者而言，文献只能提供线索，考古才能提供根据；考古不能排斥文献，但引用文献必先进行可信性研究。如果能正确处理好三者关系，尤其是考古与文献的关系，我相信这样复原的历史就有可能是有血有肉的、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历史。

徐坚的这部大作是在他于北大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学位论文《战争与礼仪——商周青铜兵器研究》基础上修改增补完成的，从那时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徐坚一直孜孜以求，心无旁骛，把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自己心爱的考古事业中，而他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把他国外有代表性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介绍到中国，让它在中国考古学土壤上开花结果。据不完全统计，他已出版和发表的考古学著、译作4部、文章20余篇。两年前，他出版了对中国早期考古学史的别开生面、卓有史料价值和理论方法建树的著作，《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当前这部著作则是他矢志将国外考古学理论方法中国化、为中国考古学研究所用的实践的结晶。徐坚成功了，祝徐坚不断有新成果问世，不断给大家带来快乐！

是为序。

李伯谦

2014年7月12日写毕于回龙观通达园寓所

■ 致 谢

虽然本书只是一个漫长的思考和探索过程的阶段性结果，但是，我仍有义务感谢一路走来得到的各种支持和帮助。本书是在我于2000年提交给北京大学的博士论文《战争与礼仪：早期中国的青铜兵器》东周之前部分的基础之上，在材料和理论两个方面大幅增补和修订而成的。虽然离预期目标仍有距离，但是，如果缺乏这些支持和帮助，本书可能至少更晚才能面世。

从十数年前的底本到现在的定本，整个写作和修改过程，甚至我的整个求学和工作过程，都离不开伯谦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无论在最初选定这个颇有点逸出传统的论题，还是在近年来对青铜兵器研究的方法和范式的反思上，伯谦师始终持宽容、支持和鼓励的态度。伯谦师从未给学生的思考预设边界，也不以学生采纳不同立场为忤。但是，宽容并不意味着纵容，伯谦师在本书形成过程中不断提出各种批评和修改意见。这种学术无禁区、探索要谨慎的治学态度是学生们终生都受益不尽的。有师如此，作为生徒，莫不额手称庆，敢不努力在继承与创新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

本书期待实现的材料、方法和研究取向上的扩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更完备的研究资料的获取。近日在东洋文库翻看梅原末治于1929年游历欧美，遍访各家收藏中国古铜器的记录时，我仍然能从纸面上读出他的欣喜之情和诚恐之意。我也深深地感谢在过去十余年中，向我展示馆藏、提供反转片、拓片及细节数据、馈赠出版图录及研究文献的诸多博物馆同仁。同时，我也需要感谢提供各种访问机会的各间大学、研究所、博物馆和图书馆，使我得以接触到更激动人心的方法和理论。感谢刘焱鸿、黄菲、何鉴菲、刘芝华、邹文婷、陈玉婷、凌艳等帮助搜罗了本书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亟需的多种重要参考文献，感谢

宋敏怡和史明立扫描了全书所用图片。感谢Isabella Donadio, Angus Forsyth, Giulia Hetherington, John Kelly, Betsy Kohut, Jackie Maman, Chen Shen, Chris Sutherns, Nicola Woods等对本书获取各家收藏器物图片使用授权的支持和帮助。本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还得到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的支持，感谢推荐人、申请评审人和成果评审人的眷顾。

本书的顺利出版有赖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吴长青先生的工作热情和职业水准。

最后，我仍然要深谢家人始终不辍的支持。感谢母亲刘静文和妻子陈焕，她们长期以来的承担和奉献使我得以无后顾之忧地投身学术。感谢一直竭尽所能地支持我的大舅刘友仁先生。非常遗憾，他于去年夏天辞世，未能看到本书的出版。兵器一度是他的生活中的一部分，他曾经是一名职业军人。

目 录

CONTENTS

■ 序（李伯谦）	1
■ 致 谢	1
■ 引 论	
考古学文化系统观念下的青铜兵器	1
0.1 超越物质形态的青铜兵器：从作为物证的物质走向超越文本的物质	3
0.2 重新观察青铜兵器的体系：宾福德的考古学系统观念	5
0.3 研究范式的转型：学术史的观察	7
0.4 青铜兵器的定名与分类	15
0.5 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考古学文化系统观：结构与方法	17
■ 第一章	
青铜兵器的形式分析：从蒙特柳斯式类型学到物质文化分析方法	21
1.1 形式风格分析的适用性和方法选择	22
1.2 东周之前的青铜兵器的形式谱系	25
1.3 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纹样分析	79
1.4 青铜兵器形态的功能化和美术化倾向	84

■ 第二章	
青铜兵器的社会层面意义：情境分析方法	86
2.1 界定考古学情境	87
2.2 作为学术史情境的商和西周考古学	90
2.3 东周之前青铜兵器个案的情境分析	91
2.4 作为社会标识的青铜兵器	145
■ 第三章	
青铜兵器的精神层面意义：认知考古学或者情境考古学取向	148
3.1 认知过程主义考古学和情境主义考古学	149
3.2 青铜兵器的文化归属表达	152
3.3 青铜兵器的性别认知和建构	156
3.4 青铜兵器的禁忌和信仰	161
■ 第四章	
早期中国的玉质兵器：从辅助线索到多元景象	166
4.1 早期中国玉质兵器的发现和研究	168
4.2 玉质兵器的形态分析	171
4.3 玉兵的多元特征：以玉戈为中心	199
4.4 金石之缘	202
■ 参考文献要目	207
■ 插图目录	235
■ 继续前行(代跋)	249

引论

考古学文化系统观念下的青铜兵器

正如字面意义所表达的，物质文化是通过物质生产表达的文化。物质文化研究就是通过研究物质理解文化，揭示特定时代、特定社区和社会的信仰——价值、观念、态度和预设。其预置前提是人类生产的物质——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直接或者间接地——反映了委托、生产、购买或者使用它们的人们，以及这些人们所从属的更大的社会的信仰。物质文化就是文化人类学或者文化史的物质性分支。

——裘利斯·布劳恩^[1]

本书是关于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基于目前的田野发掘收获，以年代推定在二里头文化三期的青铜戈为起点，青铜兵器一直是中国青铜文明器物组合的重要类别，广泛见于青铜时代墓葬之中，其绝对数量甚至远超青铜礼器，而且在使用方式上已经形成一定规范；但是在青铜器研究中，兵器并未获得可与礼器等量齐观的重视。虽然早在北宋时期，青铜兵器就已经进入金石收藏，但是一直附庸于小学范式，直到道咸之后金石谱牒范式渐成主流，才有了相对模糊的分类，晚至20世纪由金石学转型的器物学和新生成的考古学中，独立的青铜兵器类别才最终界定下来。20世纪对青铜兵器研究在分类学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对青

[1] Jules David Prown, "Material Culture: History or Fiction?", in Steven Lubar and W. David Kingery, eds, *History and Things: Essays on Material Culture*, p. 4,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93.

铜兵器的历史复原，却深受僵硬的功能主义认知和二分研究法的制约。青铜兵器仍然主要按照基于社会进化主义观念的蒙特柳斯式类型学予以分类和综合，并且按照直观的功能主义观念予以理解，青铜兵器被视为具有实际杀伐功能，或者至少以实际杀伐功能为主的器物类别，其形态变迁按照功能性动因和社会进化主义模式进行解释。青铜兵器被剥夺的非实用功能则附加在青铜礼器上，因此，围绕着青铜兵器和礼器形成了战争与和平、军事与礼仪、实用与礼用等二分观念。但是，由于预设理论的疏误，这些认知不无可商之处。基于对蒙特柳斯式类型学的盲从，青铜兵器的形式分析甚至忽略了柴尔德（Gordon Childe, 1892—1957）以来诸家的修正。柴尔德曾经指出器物形态变迁和实用功能之间的微妙关系，功能性工具的形态主要受到实用功能实现方式的制约，在工具价值得以实现的情况下，器物形态可能在较长的时间段内保持相对稳定^[1]。这一推论显然质疑了将青铜兵器视为纯粹实用工具的适当性。在本书涉及的逾千年的时间段里，青铜兵器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更遑论组合关系和埋藏情境，因此，青铜兵器形态变化的动因需要在功能性诉求以外寻找。张光直先生提出，上古中国的青铜是一种政治性资源^[2]。形态演化受到实用功能之外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影响的青铜兵器本身可能就是礼器，而传统上将《左传·成公十二年》所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阐释为“兵”、“礼”二分现象可能只是刻板之见。打破对青铜兵器的僵化认知，重新通过青铜兵器复原早期中国的礼制生活并不能全然依赖于孤立的青铜兵器个体的形式风格分析，而逐年积累的随葬青铜兵器的大量墓葬个案更具有建构价值。于是，存在于共同空间中的青铜礼器和青铜兵器便构成了相互印证、补充和强化的礼制化表达线索。因此，作为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青铜兵器构成了管窥青铜时代中国礼制的介质。青铜兵器和青铜礼器所反映的礼制曲线并不始终耦合，青铜兵器既可能呼应青铜礼器已经表达的礼制侧面，也可以填补青铜礼器疏于表达的环节。

在这个观念下，东周之前的青铜兵器的研究就不能以传统的类型学区分和综合的方式完成，而纾解这一困局的方法取向就是物质文化研究方法。具体而言，就是在宾福德的考古学文化系统和层次理论基础之上，分离出青铜兵器分别作为器具、标识和象征的表现，在不同的层面上，即不同的情境中，运用不同的方法，从物质回溯技术、经济、社会和精神。由于这种分析方法尚未广泛见于中国考古学实践中，本书对

[1] Gordon Childe,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Archaeology*, pp. 26–28,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56.

[2]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126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

东周之前的青铜兵器研究也冀望能有助于方法论和理论层面的反思和尝试。

1 超越物质形态的青铜兵器：从作为物证的物质走向超越文本的物质

兵器，与其被视为战争的物化，还不如被界定为暴力的表征。暴力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以侵害和剥夺他人表达自身意愿的自由，使他人产生恐惧、受到伤害乃至导致死亡的外力施加为特征。作为“以大的个人集团有意识地施用暴力的政治单位间的敌对武装冲突”^[1]，战争仅仅是暴力的最明确直接的表现形式。暴力绝不止步于战争，规范和法律、言语和辞章、符号和图像都可以等同地实现暴力目的。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兵器都不仅仅是身体冲突时使用的格斗器械，甚至兵器的实际杀伐功能仅构成了其意义中极其有限的一部分。兵器以杀伤和保护功能为最基本的功能性诉求，对这两种功能的追求导致了固有兵器的改进和新型兵器的产生。兵器并不仅仅使用于战场上，作为实用兵器的次生使用方式，兵器在非战争时期也必须生产、储存和改进，因此，即使在非战争时期，兵器的演化也可能敏锐地反映出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由于兵器在战场上的使用和非战争状态下的储存，兵器产生了最基本的象征性意义，即作为军事力量的物化形式。军事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政治权力的代名词，因此，兵器也进而成为权力的象征符号。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某些被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义的兵器类型被特定阶层的成员所垄断，因此，兵器可能构成身份的标识，区分同一个社会中的不同阶层。而在族群之间，某些兵器可能专属于特定地域的特定人群，因此兵器也可能成为区分族群的指向性器物。同时，兵器的实际杀伐功能中的伤害和破坏，使其具备了在精神层面上的防御和攻击的象征性功能，而形成了特定的偏好和禁忌，并进一步形成早期宗教观念，兵器又因此成为特定的精神生活的指标。因此，兵器本身就远远超出器具（instrument）层面，而成为多层意义重叠的符号（sign）^[2]。

作为特定时代、特定材质的类别，青铜兵器又有别于其他材质的兵器，材质属性对物质的功能施加了限制性影响。青铜指以铜和锡为主要成分的合金。对于人

[1]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8卷，90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

[2] Jacques Maquet, "Objects as Instruments, Objects as Signs", in Steven Lubar and W. David Kingery, eds, *History from Things: Essays on Material Culture*, pp. 30-40, Washington: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93.